

回顾，记录与重建 I

王 元 *

My Studies : Retrospect, Record and Reconstruction I

WANG Yuan

一. 前言

我打算通过这篇笔记对自己迄今为止的研究进行一个阶段性总结。准备做的事分两个方面，1. 对迄今为止的研究进行总结，特别是要补足研究对象在近期的新的变化，使研究跟上事实的发展。2. 对这些年来观察和思考过但却因为各种原因而未能进行的几个研究课题，做一个基础记录，留下一些思索的足迹。这是一些今后也不打算进行的研究。

因为只是阶段性的总结，是为了推进今后的研究的总结，所以不打算严格按照上面的顺序进行。

这次的总结以两年为期。

二. RICs2.0与 PSPs

(1)研究课题

我最初开始这一课题是在2007年前后，也就是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和上海世界博览会以前的一段时间。2010年，在明治学院大学法学部做过有关的发表¹⁾，开始提倡使用 PSPs (潜在的超级大国) 以及 RICs (而不是 BRICs) 作为

* 東北文化学園大学 経営法学部教授

学术概念。后来在《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上主编过一期《China as a Potential Superpower(中国作为潜在的超级大国)》的研究特刊。²⁾

(2) 谈论 RICs 的意义

最近,中国停滞,印度收敛,俄国更是大踏步后退了。人们不禁要问:现在谈论 RICs 还有意义吗?

首先 RICs 这个概念所指的特征具有很大的稳定性,一方面其所包含的一些物理性特征是相对固定的,被称为 PSPs 的各个国家不会因为一时的某定程度上的变故而丧失这一特征。另一方面科学技术以及思想文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这一特征,但是不足以使一个国家从无到有获得这一特征。

其实,我之所以提倡 RICs 是因为我觉得 BRICs 有缺陷。RICs 是作为学术概念提倡的,它是 PSPs 的现实可能版。

如果从 PSPs 的概念来看的话,跟 BRICs 不同, RICs 不再是单纯的金融概念,它的本质是作为复兴国家的 PSPs。的确,单纯的 RICs 仍然是跟 R (俄国)、I (印度)、C (中国) 这三个具体的国家联系在一起,在这一点上它跟 BRICs 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但是由于涉及的国家较少,更容易抽象化。最重要的是这个 RICs 必须放在复兴大国(而不是新兴国)以及 PSPs 的背景下才能发挥它作为学术概念的合理和有效性。

我所谓的 RICs 三国都作为 PSPs 国家加以分析的,也就是说它们都具备成为超级大国的可能性。RICs 并不是要否定巴西,而是认为巴西虽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 PSPs,今后具有无限的潜力,但它的这些潜在的可能性却无法在这一次的复兴浪潮中尽数显示出来。复兴是这次巨大浪潮的主要特征。

不能用一年半载的变化来看待这一概念,而是要看长期趋势。的确, BRICs 或者 BRICS 在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这只代表了这一现象的重要,并不代表它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的合理性。BRICs 作为学术概念的缺陷很明显,现在也没有改善,今后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明显。BRICs 的背后,或者说 BRICs 的水面下隐藏着的其实是 RICs, RICs 才是揭示和解释 BRICs 现象的关键, RICs 是 BRICs 现象的本质。

1) 王元「PSPs のすすめ」『明治学院大学法律科学研究所年報(27)』2011年。

2) 王元主编《研究特刊・中国作为潜在的超级大国》《当代中研究》Vol.24,Issue1 2017。

实际上现在已经进入 RICs2.0时代了。跟1.0时代相比发生了两大变化，一个是俄国由于入侵乌克兰陷入了战争泥潭。虽然不至于战败，但是被西方制裁，跟欧美矛盾激化，俄罗斯复兴的脚步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前是难以避免的。印度和中国同样发展速度变慢，前景有些不那么明晰了。中国和印度跟西方国家之间也不是十分和谐。

第二个是西方国家在中国以后没有找到一个可以替代的国家作为自己拉拢的对象。失望之余开始萌生退意。以前跟中国之间的合作，虽然各国各取所需，都有所获，但是包括美国在内，一些国家感到分赃不均而心生埋怨。最大的不满是中国在这一段时期里的强力复兴，对这些国家构成了威胁。

(3) RICs2.0：停滞的本质

外部原因是对国际秩序的变化的适应不足。BRICs 的新兴·复兴是在适应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上展开的。这主要是指以全球化为代表的战后世界格局。美国是这一国际秩序的始作俑者和强大的促进者，美国曾经不遗余力地推进和维持过这一秩序。为了诱导各国加入，美国甚至对中国等一部分潜在的合作国家做出过一些让步。1990年代，踌躇满志的美国还曾经对这一秩序的进展欢呼雀跃过。比如福山等自由派学者更是认为历史已经终结，美国可以永远万事大吉了。

不过那以后不久，随着 BRICs 的兴起，特别是中国的崛起，美国感觉这一秩序于己并无当初想象的那样有利。于是开始百般阻挠 RICs 的发展，发现无效后甚至宣称退出这一秩序来要挟各国。美国的这一转变其实来的十分突然而且决绝，世界各国有些来不及适应。

经过过去30年的发展，BRICs 各国已经初具规模，这些国家受益于战后国际秩序，它们有责任和义务维护这一秩序。一方面将更加积极地参与这一国际秩序，使之超更加有利于自身的发展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也会积极适应美国的变心，为新的国际秩序做准备。

失去了对手的美国衰落得很快。MAGA 是否能真正使美国重新伟大这很难说。

BRICs 在过去的这20年里呈现的是一种疯狂的发展。远远超出学术研究所能追及的范围。这本身就有很大的指标性意义，BRICs 在现代世界上是一种具有本质意义的现象。国内所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指出的也是同一个方向。

其实，中国的发展速度变慢很容易理解，几乎就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这一

点我在以前的论文中也做过分析。只有中国崩溃论者才把它当成一个奇货可居的新鲜事物。

印度发展速度变慢也是有具体原因的，比如以前我分析过的①教育跟不上产业的发展，无法像中国那样提供优质廉价的天量劳动力。现在已经进入 AI 时代主导的自动化时代，今后廉价劳动力的重要性也会进一步下降。②第三产业优先发展，第二产业滞后特别是能够大量提供工作机会的制造业的不发达导致印度在跟东南亚竞争 Chin+1 红利时处于不利的地位。实际上制造业已经被中国先声夺人，要想从中国虎口夺粮不太容易。③印度基础设施滞后。④远远超过其基尼系数的社会财富差距以及⑤国内优先的消费结构。这些特点由于跟后期发达国家类似，经常被用来作为印度的先进性的证明。但是说到底是违反新兴经济发展的原理的。不仅如此也同样违背了欧美新教资本主义伦理的和东亚的话儒教资本主义伦理。

消费优先的发展模式导致吃完用光，不利于扩大再生产。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规模扩大，国家经济大而不强。东亚儒教资本主义原理被认为跟欧美新教资本主义伦理在基本原理上是一致的，只是多了大干快上以免掉入发展陷阱爬不出来这一点。这也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必经之路。亚洲四小龙对亚洲四小虎的优越性也尽在于此。

印度有必要从自身的传统中发展出一套建立在实用理性基础上的思想体系。这种模式说到底是违反了后发现代化的基本规律。

广泛受到西方世界称赞的印度国家体制也存在一些结构型的问题。这主要可以分成以下几个方面：①叛乱的地方政治，特别是农村地区。这显示出印度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整体性、统一度以及治理水平不够高。②印度教民族主义对伊斯兰教的压迫日趋激烈，二者之间的冲突的强度居高不下。③印度得到世界各大国特别是美西方国家的吹捧和拉拢，在世界层次上的国际关系良好，但是近邻强敌环伺，在周边外交上面临巨大的挑战。④缺乏问责机制的殖民地民主政治造成的政治腐败在巨大的国家规模背景下尤其突出，改善也遥遥无期。⑤选举制度上的不合理造成极多的死票。⑥印度等 RICs 不是中等国家，从前的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老路现在不好走。⑦莫迪的权威主义经济运营方式是近年来印度经济繁荣的“制度保障”，但却跟传统的殖民地民主主义之间存在着剧烈的冲突。莫迪经济学的可持续性缺乏制度性保障。

俄罗斯即使走到了现在的这条道路上也不至于像历史上中国那样多次被打回

原形。不过，俄罗斯存在不走到现在这条路上的可能性吗？

现代化初期曾经是敦促，促进的各种动力因素因素，到了后期将成为反动力因素。平稳发展难以促成现代化的实现，这决定在一定期间必须只争朝夕，大干快上。

(4) RICs 之间的竞争关系

以上正是进入 RICs2.0时代的特点，今后还会进一步发展。特别是 RICs 之间的竞争关系今后会越来越凸现出来。类似的发展方向并不必然促使这些国家结成牢不可破的同盟。

印度发展速度变慢敲响了警钟。不仅仅只是教育跟不上产业发展以至于人口红利发挥不出来的问题，这些情况只要有时间，总有一天都可以得到解决。但是在动荡不定的高竞争性时代，一个国家的发展是有可能被迫中断，被打回原形的。中国从前就多次遭遇过这种情形，既有国内的因素也有国际的因素。最近跟美国的对立便是国际因素的最直截了当的表现。

其实，对中国来讲，尚未出现来自发达国家的能够真正阻碍 RICs 前进步伐的东西。

但是 RICs 之间的冲突却有可能令它们停下前进的脚步。RICs 之间的冲突会受到世界上很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热烈欢迎，因为这会形成比俄国入侵乌克兰更为巨大的双倍的渔夫之利。

130年前，中日两国曾经在富国强兵的道路上迎头相撞；20世纪初，德日与英法也在强化列强地位的道路上拼了个你死我活。这些其实可以被认为是两种不同种类的现代化方式之间的剧烈竞争。先发与后发之间矛盾激化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中印两国需要在这一点上引以为戒。

(5)中国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不存在一直能够高速增长的经济，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以后出现减速是必然的。虽然减速并不必然导致掉进陷阱出不来。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新兴国家都掉进了这个陷阱。有一定规模的国家中，韩国是最近成功的国家，日本则是上一个没有掉进陷阱的国家。但是这两个国家在这条道路上也是十分凶险的，韩国的政治局势至今不稳，当初日本更是几乎万劫不复，还把周边各国牵连了进去。

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现代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实际上这一

概念不应狭隘地只限于经济领域来看。不同的现代国家也可以理解为这些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的几个阶段(或称适应态)。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过渡会伴随着不稳定和不确定性,只有到达下一个阶段或下一个适应态才能相对稳定下来。中国重视教育和科研创新,这使中国比印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能力要强得多。但是中国真正的强处应该是一开始就从战略上对下一个适应态的追求。

陷阱从经济发展过程来看的话可以分为四步。

①首先是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乃至失速。比如掉到3%以下,这样会令把蛋糕做大的盘算落空。

②接下来,由于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引发停滞,人们把注意力放到分配上,从而引起社会不满,紧张和动乱。

③再接下来,政治社会制度,体制受到质疑,体制问题“积重难返”,深陷陷阱。

④恶性循环,最后,崩溃,失去迄今为止得到的所有的成果,被打回原形。回到出发地,重新出发。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上曾经不止一次经历过上述过程。

至于这次的中国还要加上另一个特点,就是人口红利的消失。不过在AI时代,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或许可以得到弥补,最近似乎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提高潜在增长率就很重要,过早地拉动需求不是好办法。配套制度改革也很重要,城镇化,户籍制,国有企业份额过大?

我在以前的论文中曾经强调过,国家的规模在这里也有一定的关系。在早期的近代化过程中,反应速度快的中等国家比巨大国家更容易度过这一难关。但是到了现今的阶段,巨大的规模却成为一大优势。

经济转型,产业升级最重要,科学技术,创新难的多。

速度对现在很重要,创新则是未来。在速度跟创新无法兼顾时,宁可牺牲一些速度也要保证创新。

前期的积累很重要,这样可以在后半经济减速时作为后继的动力源为体制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但是要一个国家从道理上理解这一点不难,实践起来却不容易。这在个人层次上相当于平时良好的生活习惯,只有平时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才能未雨绸缪,有备无患。

可怕的不是减速,不是低速,而是失速。莫名的失速会导致人们对国家失去信心从而导致社会紧张进而又反过来导致经济崩溃、政治动乱和社会崩溃。中等收入陷阱更多地是一个政治问题,考验的是一个国家的战略定力和治理能力。在这一方面对中国是有利的。持续了40多年的史无前例的经济发展为中国的现代

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重视教育和创新使中国的科学技术也能跟上产业发展的步伐。中国这次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6)作为另类 PSPs 的日本

日本无论是人口科技以及经济实力等国家规模方面都是世界大国。国土面积稍显狭小,但是广袤的海域使用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资源的确匮乏,这是一个天然的缺陷,只能后天努力加以弥补。当然这是在世界工厂,外贸经济得以顺利展开的前提上的结论。

日本在这一点上跟德国极为相似,两国都紧邻资源大国俄罗斯,但是由于缺乏独立自主的外交,无法像默克尔时代的德国那样有效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把工厂外移到中国和东南亚是解决资源问题的另一个有效手段。这使日本拥有了庞大的海外产业和资产。但是日本人经常会忘记这些海外产业和资产还不同的。是有条件的。不进则退的海外产业和资产,受制于当地国,很容易被逐步自然消耗。

三. 现代中国10年的动乱周期

(1)研究课题

这是一个我长期关注的课题,实际上我从学生时代就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代表性的成果为一文³⁾一书⁴⁾一会⁵⁾和多次演讲。由于典型的10年周期已经终结,所以这几年主要限于追踪分析。现在面临的问题在于,尽管典型性的周期已经完结,但是那以后10年周期仍然在起作用,我们还是不得不对此做出解释和回应。

迄今为止的分析得出了以下的结论:

①20世纪中国10年的动乱周期是开发体制内在矛盾的一种表现方式。这种开发体制包括了政治、社会和经济各方面,因此十分强健坚韧,很少受到外力干扰,具有规律性极强的特征,其整齐划一甚至超过了一些经济学所谓的规律。

②进入21世纪后,这一周期的规律性大大减弱,可以说已经基本上到了终

3) 王元《中国现代政治史的形态》,王元编著《宏观中国政治》白帝社2004年。

4) 王元编著《宏观中国政治》白帝社2011年。

5) 2013年11月18日早稻田大学国际会议场,参加者有吴国光,西村成雄以及谢岳,刘迪和王威海等。会上发表的论文会编为《研究特刊·20世纪中国政治周期专刊》《当代中研究》Vol.22,Issue2 2015。

结的时期。

③下一次是在2026年开始，2027年被认为可能性最大，而2029年则将面临最大的关头。

④具有从上向下，由内到外发展的特征。内部从中心逐渐向边缘肃清，这也是中国进一步统一，一体化的过程。这有可能意味着某种外溢性。

⑤尽管内容和性质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1989年以后就已经不再是典型的20世纪中国社会动乱了，但是大约10年的周期性却延存了下来，似乎即使周期性的原因已经衰退了，但动乱的原因尚在，而且受到某种历史惯性的影响，各种矛盾的积累仍然需要定期释放。

在一定程度上这可能得益于整个社会已经习惯于按照10年的期间来思考问题，做计划，调动人事，当然整十周年效果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实际上可能还因为中国人从意识上也适应了多少年一变的定式，自然而然了。这些都只是猜测，说到底需要实证研究来证实或证伪。

(2)香港动乱完成了周期性动乱在大陆的基本轮回

在最近的一篇中，笔者对2019年香港动乱进行了分析⁶⁾，同样也是把它纳入周期性动乱的范围。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动乱即将结束，这意味着在香港·台湾动乱以后，中国的社会矛盾的表现方式将进入一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周期性动乱与动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对所有的政治体制来说，动乱永远不可能结束，但是动乱的性质和形式是会变化的。

从这个角度进一步分析的话，一个可能就是台湾成为下一个动乱的发生地。而且实际上还有可能成为周期动乱拼图上最后的一块。

最后并非是说今后就不发生动乱了，而是说周期性动乱将完全终结。

这么一个巨大的国家，永远都会有问题提出现，上一个问题解决了，下一个问题又会出来。有时候正是因为有问题不停出现，不得不一个个予以解决，结果就是国家一直朝前发展，所以才有进步。

6) 王元〈周期性社会动乱在现代中国的基本轮回：以2019年香港动乱为例〉《综合政策论集》Vol.20, 2021.3。

(3)台湾成为下一次动乱的有力候补

实际上当初台湾民进党当局颇有接过这一接力棒的主观意愿。蔡英文一期时就曾多次在香港问题上挑事并从中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利益。蔡英文的第二任期来之不易，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两个事件，一个是王立强事件，更大的一个是香港雨伞事件（2014年“占中行动”）。台湾是香港动乱的起点，是策源地之一，也是香港动乱势力的后方基地。在台湾本地则发生了所谓的太阳花事件（2014年“3.18学运”）。当时的民进党当局不顾这样做有可能会引火烧身也做了出来。

下一次是台湾的预测前几年曾经十分流行。但是最近这一预测有所下降。主要的原因可能跟俄罗斯的乌克兰进攻有关。蔡英文二期以及后续的台湾当局似乎意识到乌克兰积极挑衅俄罗斯的做法很危险，后来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收敛。美国的态度暧昧也使民进党不敢迈出最后关键的一步。国民党和民众党对台湾当局的牵制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虽然岛内独立意愿在过去的三年里大幅上升，但是对两岸和平的意愿更加强大。但是更为重要的可能还在于，中国在隐忍了数年以后终于下重手整治乱港分子，香港渐趋平稳对台湾发生了强大的警示作用。

至于大陆方面，以大陆的军力，现在开打的话拿下不难，但是一旦动武，需要打到什么程度谁也不说，而且今后统治也是个问题。

不过，对中国来讲，台湾不是新问题而是最老的问题之一，是一个从建国之初甚至是建国之前就存在而一直未能解决的老问题。这一老问题不解决，其背后的新问题也就不会出现。

2027年曾经被认为是一个关键的时间，但是最近这种可能性下降了。特别是在特朗普确定重回白宫后，这种可能性被认为有可能进一步下降。

这是中国国内的政治周期受到国际形势的影响的最新的例证。因此也无法排除受到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这种可能性重新返回并再次激化的可能。

在日本，“台湾有事”曾经是颇受瞩目的话题，而且有些分析直指2027年。尽管这些看法的角度跟笔者完全不同，但其结论却与周期说不谋而合。

(4)关于情感替代

我在以前的研究中曾经提到了一个概念：情感替代。这是我的一个猜想。它指的是这样一种可能性：动乱参与在消除压力与缓解紧张的功能中，大部分实际上并不一定非得实际参加才能达成。实际参加动乱的人在社会中只是少数，参与组织和指挥的人数就更少了。绝大多数人都是跟动乱没有直接关系的，他们是通

过耳闻目睹参加的。人类的同理性导致他们同情或反对动乱，进而跟动乱之间产生同感，共鸣，共振或对抗或自制和反省。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即使他们没有亲临动乱的现场，但是也能通过耳闻目睹和想象在精神上参加动乱（或反对动乱）的活动。绝大多数的人还是这样通过“虚拟”的方式参加动乱的。

这一现象在《宏观中国研究》的〈分散社会压力和缓解社会紧张的机制〉⁷⁾一节中有过比较集中的论述。在那里，我曾经指出，动乱在大多数情况下，其实在迄今为止的中国近现代史上从未达到过其起始的目的，相反大都带来了跟初衷相反的结果，这就是巨大的混乱甚至崩溃。大多数情况下，只要参与，不论以何种方式，都能实现这种情感替代。至于最初的目的为何似乎并不重要，甚至很多时候被弃如敝屣。

我怀疑西方竞争性政党政治，特别是两党制的所谓的稳定的功能也是通过上述的过程得以实现的。教科书上一般对两党制的稳定功能的描述往往都有避开它的非效率性夸大它的稳定功能的倾向。稳定功能是存在的，不过不是通过真正解决问题，而是通过情感替代达成的。议会辩论以及竞选活动就是最具代表性的活动。

现代科技的发展极大地扩大了上述现象的作用。高度发达的通讯使我们对万里之外的事物感同身受。

中国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地区性国家，而是一个全球性大国，中国人的情感替代的范围已经扩大到了全世界。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将不再是下一次的唯一选项。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区域都成为这个选项存在的范围。关心程度相同，稳定的效果也是相同。

判断的标准是人们关心程度的高低，关心越高则稳定的效果就越高，反之亦然。从前最受人瞩目的是北京这样的政治中心，天安门广场成为舞台；后来是民族自治区，再后来是港台；而今后跟中国对立的国家和区域有可能成为焦点。这种情感其实是一种自我暗示，而且还很有零和竞争的性质。吃还是被吃，就看一个国家是上行还是下行了。如果这次不是台湾的话，这种情感替代的作用就更值得重视了。

7) 王元编著《宏观中国政治》白帝社2011年第58-60页。

(5) 向社会性混乱的转变

不过也不能无限地夸大情感替代的作用。能被替代的一般而言都是那些本来就不切实际的需求，那些属于时代发展需要的根本的情感是无法被替代的。自上而下的官方的替代行为有时确实能够成功，有时却又适得其反。

今后的发展方向有可能是大型的低强度抗议形式的动乱，也就是那种普遍参与的政治色彩较淡的社会性混乱。

既然动乱更多的是一种感情的发泄或宣泄，不仅如此，它还有替代作用，不一定非得达到原来设定的目标，只要情绪得到发泄或宣泄就能缓和压力和紧张。

并非只有那些固定的方式，其他的各种方式都是有可能的。

动机的政治性减少或下降，这也可以称之为动乱的社会化。到了这一步，动乱就制度化了。它将不再作为社会中异常的，对社会发生负面影响的现象而存在，而只是作为社会的一个特征存在。

(6) 周期性动乱的动力

近代以前的中国社会看不到这种持续百年的10年周期动乱，这是现代中国特有的特征。除了原因和动机，动乱的动力也是一个值得分析的方面。高强度的社会动乱消耗大量的动力，前近代社会所积累的人力物力都不足以支撑。

中国历代统一王朝的确都有一些空前的盛世，但是由于人们更多地还是生活在本地，对国家大事的了解和关心程度并不高；社会高度依赖靠天吃饭的农业，社会财富的保存手段很有限，积累程度更多地还是以社会差距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此外，由于地域上的融通性比较低，社会的结合度比较低，动力的输送还存在着地域上的限制。

中国在秦始皇统一中国那一段时期曾经有向更高层次发展的可能性，在汉朝转向独尊儒术以后就基本上放弃了这一方向。儒家的社会理念是中庸不强求，不追求高度的结合度，是一种比较自然的状态，更多地是由地理气候以及文化等因素支撑的。这也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在近代以前一直都比较淡泊的原因。

儒家以及诸子百家对国家的思考致使中国的古代国家形成了一种立体的结构，但这在近代以前主要地还是在思想层面而非社会和经济的层面。“仁”和“中庸”增强了儒家思想的韧度但却限制了其强度，这也是“孔家店”在现代不受待见的原因。

中国已经在治理国内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情绪有所遏制。一度兵凶战危的

台湾海峡渐趋平稳。祖国统一的大业不容掉以轻心。特朗普2.0会给中国提供某种机会吗？

(7)动乱要因黑字国家

就动乱的要因而言，中国在过去的20年里已经成功地把自己从输入国转变成了输出国。反观美国，一如既往地大出大进。美国改变不了长期形成的行为方式，对世界各国大量输出动乱要因，同时也百无禁忌地输入。输入了哪些呢？例如，颜色动乱类的，民族分离分裂类的，宗教的，甚至是邪教类的。还经常告诫别国别怕。

但是美国不怕是有原因的。一个是新边疆的存在，另一个是霸权红利。这我曾经跟依田先生讨论过。

但是时过境迁，百毒不侵已经成为过去，所以特朗普现在需要动手术刮骨疗毒了。

四. 现代政治中的政治与行政关系

(1)民主政治体制的后退

当今世界的一大特征是所谓的欧美政治体制纷纷陷入功能衰退的境地。2000年代先是日本、英国，2010年代在美国国内出现了MAGA 特朗普体制。最近，欧洲大陆上的德法两国同样陷入了困境。更是美国国内科技金融巨头纷纷来投，更是出现了MAGA 特朗普与科技金融结合的寡头政治体制。

美国是一个英雄崇拜的国家。过去一段时间对英雄的需求急剧上升，于是各种超级英雄，超能异能力者，灵异，超凡脱俗纷至沓来。人类社会正在进入一个科技治国的新时期，比如算法治国，AI 治国等等。问题在于，美国这次起于硅谷的科技治国，并非大规模的科学技术的社会性导入，而是少数持此类主张的科技异能论者主政治国，本质上不过是一种科技寡头而已。后退的根本原因在于它的贫困和不屑于（其实是拙于）改良。

相反，各国的民粹主义和极右的政治势力却大行其道，而且最近出现了横向联合的趋势。

根本的原因在于极端的自由民主主义已经成了狭隘的意识形态教条，甚至背离了民主的大道。没有限制的言论自由对大多数的民众来讲并无实质性的意义。

对言论自由和少数者权利的过分的强调不符合常识，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还是更加关心和追求那些更为基本的自由和权利，这也是其他各种自由和权利的基础。美国比中国有言论自由。但是美国的言论也有所谓的“政治正确”，也不是绝对自由的。两国之间的差只是侧面和程度的不同，并无本质的区别。

第二期的特朗普政权 MAGA 有可能会前所未有显示其时代特征。这一趋势揭示出来的一个时代特征就是自18世纪英国沃波尔时代（在美国要晚一些）以来的党魁政治的终焉。甚至有可能预示着启蒙时代以后的各种以人为本的政治的告一段落。

(2)霸权保佑美国

福山历史终结论没几年就出现了这样完全相反的历史，向右转似乎成了新的历史潮流。为什么会如此呢？

首先，无视人类历史的事实，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根本就是错误的，它本质上是一种劣化版的历史决定论。美国不一定就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好的政治体制，世界上也不存在永远最好的政治体制。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根本缺乏多元性，也没有包容性。

作为价值观的民主是个好东西，在民主化的道路上，各国都是发展中国家。各国都有一些好的尝试和实践，有经验也有教训。可是包括美国在内，世界各国并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真正足够实现民主。美国政治科学在思辨性上存在根本的缺陷，其对民主政体的合理性以及有效性的学理上的说明是不充分的。这一点我早在学生时代就注意到了⁸⁾。

其实美国的政治是一种粗放型的政治体制。笔者以前跟依田喜家先生的对谈中就曾提到，美国虽然建国也有两百多年了，但是国家体制却一直没有得到真正的验证⁹⁾。跟世界上其他历史悠久的国家相比，受到无限边疆和世界霸权层层保护的美国始终只是一个例外，是一个神话而已。同等条件下，别的政治体制有可能会更高效和民主。

帝国走上金融的不归路是历史的必然。范伯伦早就论述过这一现象。金融资本的特点是更高的资本集成和更大的社会差距，这是寡头政治的社会和经济基础。

8) 王元〈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研究Ⅱ〉《经营法论集》Vol.1, 2022年3月第27-46页。

9) 依田喜家·王元编著《东北亚研究论丛Ⅱ》白帝社2010年第172-179页。

到了这一步，接下来的进展就很快了。首先是政治体制的协调性会下降，其次因为受到 IT、网络以及平台经济的暴力冲击，旧的再分配制度失效了。接下来由于缺乏国家的强有力的再分配制度，中产阶级日渐消瘦。迄今为止，与其说是上帝保佑美国，不如说是霸权保佑美国。没了这层保护，美国照样也会陷入动乱，而且真乱起来的话，会很剧烈很难收拾的。

(3)合适现代人类的政治体制

现代政治体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党政关系，也就是(党为代表的)政治与(包括司法在内的)行政之间的关系。似乎有必要写一本新的《政治与行政》？比如《政治与行政新论》？或者《政治与行政Ⅱ》？为各国重新设计适合现今世界的政治体制。

其他的都好说。言论自由，人权，法治等等，虽然因为各自的环境不同，表现不同，各国都大差不差。

一国民主主义已经不适应当今世界了，需要超越。特别是政党政治在这里似乎需要重新定义。人类已经进入算法治世的时代，算法即将成为法律和秩序。

现在的多数正义和民主指向在现有政治体制下碰壁。网络扭曲民意的能力越来越大，投票已经投不出真正的民意，决不了策。对投票结果的反悔越来越多，越来越快。

现在的问题是多数正义的非正义性越来越多出现使它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这些自命非凡的民主体制越来越偏离了民主的大道。以色列对周边的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对巴勒斯坦的残暴行为是一个以民主为价值观的国家做得出来的吗？今天的以色列跟俄罗斯有什么区别吗？俄罗斯是不是权威主义的民主政治还有待论证，但是以色列确是不折不扣的民主主义的寡头政治。福山坚信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这真的吗？

这种缺陷很多的民主体制能够在当今世界上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的示范效应。时到今日，已经到了全面更新的时候了。

(4)全过程与全能主义

党国体制下的中国其实是党政结合型的，而非党政分开型的。“全过程”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另外，全过程这种说法基本上局限在政治过程的层面，算不上“主义”。全能主义不仅限于政治而且包括社会各方面的含义。

一党和多党的真正区别，这可以从不同的公务员制度看出。从政治中析出来的行政会成为政治的附庸，成为国家机器上的言听计从的忠实的部件；而独立出来的行政则会对立，分庭抗礼。那么美国呢？两者都不是，而是被设计成对立和分庭抗礼的。

全过程民主基本上就是我多年来一直强调的全能主义。这是一个由邹说提出的概念，既不同于极权主义又不同于权威主义（威权主义），介于二者之间，又有一定的中国特色。根本上说就是中国特色的党政一体（结合）型政治体制。当代人类政治体制的不同形式如何划分？怎样划分？应该可以按党政关系划分。

(5)需要重新认识和评价政党。

特朗普已于带领美国回到杰克逊时代，但他忘了美国那种分开型的政府体制对公务员体制的要求较高。追求专业高效的公务行政无法由素人政治家胜任，特朗普之类的素人（严格来讲特朗普已经到了第二任期，不再是素人了）政治家集团上台的话，公务员更需要大有作为以弥补素人政治家的缺陷。从特朗普任命的内阁成员的经历来看，来自五湖四海的政治素人较多。特朗普任人唯亲，任人唯忠，跟对象的知识和专业背景相比，对人气的要求更高。

现代政治体制在专业分工的需要导致公务行政从政治中分离出来（析出）。但是在美国，长期以来的两党政治轮流执政，上台前设立影子内阁，上台后对公务员的严重依赖。

美国的问题长期以来被霸权红利给掩盖了，到了霸权红利保护越来越少的今天，公务员体制就更重要了。但是现在的美国，公务员体制被看成是所谓的“深层国家”的一个部分，而这也是马斯克的效率部正计划大刀阔斧地把联邦公务员砍去一半的原因。这一做法有很大的危险性，新冠以后美国的行政体制效率低下，人浮于事，大量减员有可能会造成公共事务堆积如山，搞不好弄巧成拙会使美国政治体制陷入功能衰竭的巨大危机。

官僚主义，人浮于事，这在几乎任何组织都不可避免。时代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也会导致一部分人员跟工作之间出现乖离的问题。所以需要经常搞一些动作去除这部分冗余。但是，不能搞过头，否则伤筋动骨，适得其反。马斯克所说的三分之一，或者一半是不可行的。一般一次减5%可能是个比较合理的比率，考虑到美国现在的情况，新冠以后懒人更多，10%可能需要吧。

(6)多数正义

多数决的投票政治现在碰到了前所未有的考验。这种做法虽然时常被当做现代政治的金科玉律，但它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一个回答不了的问题：为什么多数就必定代表正义？这个问题从来就没有得到过回答，只不过一直被无视罢了。而到了今天，又面临着各种技术性问题。

霸权红利部分失效以后，既存的政治体制的合理性，进而其合法性受到了质疑，有的时候是直接的，有的时候是间接的。直接的以美国两党的对抗为代表。红利丰腴的时候，风水轮流，轮流坐庄，也不急在一时，但是现在，通吃都吃不满足，难容别的党派置喙。间接的以日本为代表，表现为投票率的低下，个人层次上表现为对自己的一票的价值失去了信心。既然投与不投没啥两样，干嘛去投票？

MAGA 有可能给多数决的投票政治以迎头痛击。这次拿到了无可争议的大多数的特朗普如果再失败的话，将会发展成纳粹以后最大一次对民主政治的质疑。日本和德国都是民主化的过程中发生变异的。德国是魏玛共和国的变异，日本则是大正民主的变异。民主容易变异是个普遍的现象，因为这是一个开放的过程，是一个自由化的过程，喷发出来的很多东西如果不能成功收敛起来的话就会恶变。民粹主义正是这一过程的前半，接下来会因为国家体质的不同朝两个方向发展，一种是兵强马壮斗志昂扬的国家，会朝外发展。比如发动侵略征服战争。另一种是除了政治体制以外社会上并无多余的力量存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窝里斗，内部冲突。

多党制的必然性。作为民意代表，个人单位的政治代议并不具备政治活动中的可行性，因为这会导致民意的原子化，反过来事后的民意也无法及时监督自己的代表。政党制度实际上是一种连坐性质的政治责任制。

或许只有实行直接民主制的瑞士在这方面的要求少一些？因为在瑞士，政治与行政二者一直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

(7)从心所欲无逾规的特朗普

美国社会现在一是分裂成两大党派激烈对抗，二是混乱，两派各自的内部也不安稳，三是政治治理的不在。自奥巴马以后，政治家变得无足轻重，不过靠口无遮拦，草率轻薄，甚至自甘堕落让人耳目清新而已。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特朗普会获得一定程度上的成功。美国是一个得天

独厚的国家，无论怎样干都能获得一定的成功。这涉及到评价体系的问题，至于从长期效果的角度该如何评价可能就是另一回事了。问题在于，特朗普政治是以否定和破坏美国现行政治体制的形式出现的，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会对美国的民主主义政治体制造成巨大的伤害。马斯克带领一众革命小将追无不及，特朗普MAGA自然就战无不胜，结果是深层美国被攻无不克。

中国没有必要完全拒绝跟特朗普个人之间的各种交易。但是跟特朗普政权之间就需要注意了。

即使特朗普内心不一定就是要跟中国怎么样，但是美中之间还是有可能走上直接对立。

尽管大权在握，特朗普并非万能，失控是有可能的，而且可能性还不小。

特朗普第一任期时中国对他有些期待，他跟中国领导人在北京相见甚欢。应该说当时特朗普是有跟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关系的意愿的。但是回到美国后不久就急转直下了。中国在那一段时期并没有什么变动的迹象，发生了变动的要么是特朗普个人要么就是特朗普身边的某个亲信。特朗普的一大特点是即使他听信了幕僚的建议，他也会强调是他自己拿的主意，并且这个决定绝对是正确英明的。

特朗普政治是极端的人治。他在长期的经商人生中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用人方式，就是直接控制部下，要所有的人都直接效忠于他一人。这个政权几近王权，期待它比第一期有进步的话，大概率会落空的。

特朗普精力过人，他的做法在一个企业的规模上或许没有大问题，但是美国是一个超级大国，规模跟企业完全是不同的层次。从人际关系上看，特朗普建立的是一个狭隘和脆弱的权力结构。特朗普的惯用方式行得通吗？分封多位家族成员出任政权高官，再考虑到他老人家的高龄，大权独揽，日理万机，对此我持高度的怀疑态度。

第一次特朗普政权的結果已经昭示，特朗普特自信自认为能够把握一切，但是实际上特朗普治下事与愿违的事情经常发生。

就像伊万卡和库什纳那样，二人跟特朗普2.0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我们应该记得特朗普跟他的亲戚之间的关系是很有问题的。他的心理学家的侄女（Mary Lea Trump）甚至写了一本书（《永不满足：我的家族如何制造出了世界上最危险的人》）大爆乃叔的黑料。这些长期就近观察过特朗普的亲人应该比社会上隔着好几层关系的人更加了解特朗普的人品和人格。一般的选民看到的特朗普是非常表面的。世人有可能对特朗普的真诚有误解，但是本应跟他亲近之人也这样误

解他的话，只能说是他的为人处世，他的品格中颇有容易导致近亲厌恶的成分。

第一任特朗普政权各部长官纷纷中途离任，人数之多到足够另组一个政府。他们对特朗普评价一致：才能出众，但却度量狭窄，难以容人，无法共事。特朗普第二次政权更是召集了三山五岳的人马构筑了一个松散的权力结构。对部下说滚，很容易，也很爽。既然有众叛亲离，自然也会有树倒猢猻散。

最近国内给卢比奥改名为“鲁比奥”。可惜新华社的外国人名词典里早就定下了“特朗普”，比特朗普更好的是川普。我则更倾向于“唐川普”，不仅跟中国文化的契合度很高，还有欧洲的贵族气质，而且也跟接美国流行文化的地气。老矣唐川普，软实力却比唐老鸭不遑多让。再给唐川普二十年，还 MAGA 一个伟大的美国？

特朗普想做的事情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除非诉诸武力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做成的。如果真想在四年里做的话，除了打有别的方法吗？

(8)超凡魅力加身的特朗普

作为乌合之众的 MAGA 是形成特朗普克里斯马性的丰饶的土壤。这种超凡的魅力，往好处说它是一种关键时刻能够力挽狂澜的力量，往坏处说它是一种毁灭的力量。狂野的民粹主义为特朗普扫清了很多障碍，现在的特朗普已经近乎无规可逾了。

最大的问题可能在于，躲过暗杀第二次上台的特朗普的超凡性导致对他的制约力量的急剧下降，特朗普已经可以从心所欲无逾规。这是很可怕的事。

跟特朗普政权交易，无异于与虎谋皮。当然中国也不用与之正面对抗。民粹主义的力量同时具有所向披靡后自我毁灭的特点。

特朗普 MAGA 如果成功的话，那将会是对美国政治原则的一次重大挑战和否定。

退任的拜登忧心忡忡地提醒美国人民：MAGA 阴影笼罩之下的特朗普科技与金融寡头政治会把世界引向何方？往坏处想，不仅会把美国带到崩溃的深渊，甚至有可能吧全世界都牵扯进去。往好处想，或许能给世界带来一次重新审视的机会。教科书上讲的那些原则原理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理？

现在政治学越来越不好教。美国，特别是特朗普这样一搞，我们在大学里教政治学可就为难了。

(9)政治与行政的拉扯

这次特朗普和马斯克提出了新的挑战，誓要将联邦公务员的人数砍去一半。MAGA 将会构成对美国的公务员制度，以及三权分立构成严重的挑战。

在这一点上，当今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受到了来自美国的影响。其中有些该接受，有些不该接受。有些根本没有资格接受。因为它们完全就不是一回事儿。跟世界霸权没有或者扯不上关系的国家，实行美式政治体制无异于自杀。

这么一个大国永远会有问题存在，一个解决了另一个就会出来。不停地出现问题 and 解决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发展的方式。

民主政治作为一种价值观在东亚具有十分广泛的人气。特别是在汉字文化圈，民主主义作为一种“熟语”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甚至超过了只把它当成“术语”的欧美。当民主主义不再是国家利益时，美国放弃它的速度是很快的。

五. 电动车

(1)研究课题

我自2016年开始注意这一课题。日本的车企当时采取的是所谓的全方位战略，而且各大车企也的确在新能源的各个方面都很重视，在各种专利上都有一些领先。所以一开始我以为日本的各大车企是因为未来的发展方向尚未明确，多管齐下也是给自己留个后手。等未来的方向一旦明确，日本的车企就会迅速把注意力集中到一个方向。但是后来明显日本的车企没有这样做，一直在逡巡观望，犹豫不决，丧失了很多时机。

感觉到这一问题事关日本社会今后的发展方向以及人民的生活，我开始在课堂上，特别是研究班中每次都提及这一问题。期间日本在这一问题上每况愈下，危机日渐深重。第一次公开讲这一题目是在2022年4月作为学科教务委员在当年新生的基础研究班的导论课上。但是在这里只是记录我的一些关心和观察，今后并没有进行系统研究的打算。

(2)新能源转型

人类在工业革命以后，毫无节制地向大气层中排放了天量的温暖化废气，当今世界的以 G7 为代表的发达工业国家贡献了其中的绝大部分。

因为严重的环境污染，各工业国家纷纷把高污染的制造业转移到劳动力丰富

而且低廉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虽然获利甚微,但是获得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本来这是一个双赢的互利合作。但是一方面它带来了发达国家的产业空心化现象,另一方面巨额的国外利润拿到国内以后由于分配不均造成了社会差距急剧扩大的问题。

与此同时,中国这样的复兴国家先是不惜以牺牲自己的环境为代价完成了原始积累,把制造业抓在了手中,进而又逐步光复国内市场并开始向世界市场进军。到了这个时候,发达国家发现形势的发展超出了它们最初的预料。

于是地球温暖化提上了议题,向绿色再生能源的转型成了解决方案。中国自然心有不甘,但最初由于势单力薄,形不成有力的反击。只能一边对外抗议,一边在国内以决绝的气概挖潜创新,开始了全方位的能源转型。其中最突出的便是电动车的普及。

中国当时在新能源上很落后,没有自己的人才,技术和市场,差不多就是一穷二白。但是中国没有想到的是,发达国家的所谓的新能源转型主要还是用来教训中国的,各国自己并没有怎么当真。最初中国虽然技术十分落后,但是贵在努力实干,竟然一步步追赶上来,进而一部分后来居上了。

其实,在新能源转型这件事上,中国也不是一无是处的。中国的优势,一是一穷二白但同样也没有无法割舍的既得利益方面的障碍,可以放开手脚尽情发挥。二是新能源转型是个系统工程,不仅仅是新能源转型本身需要花功夫,跟它配合的基础建设工程浩大,只有中国这样的基础建设百废待兴的基建狂魔才能玩得转玩得好。三是政府支持,把环保和能源转型当成国家复兴的大业来搞,押上国家命运来搞。四是只是在一开始进行了多种试错,一旦选中电力后就投入全身心,心无旁骛,没有分心去搞什么全方位战略。

(3)特朗普2.0的冲击

特朗普2.0将会给电动车的普及带来很大的冲击。这主要有三个方面,①特朗普政权全面放弃了民主党政权的能源政策和减碳政策,重新回到大力开采国内化石能源的老路。②这对美国国内电动车的普及直接带来巨大的冲击。除了特斯拉等少数车企,其他的新兴电动车企业面临生存危机。现实中,一家独大的特斯拉难以支撑电动车普及所需要的增长速度。③美国同时退出了巴黎全球气候协定。这会否引起连锁反应,现在不得而知。

电动车强大对中国来说是好事;但是强大到以至于世界各大汽车强国都难以

企及，难以有所作为的时候，各国是否还会跟进就很难说了。如果各国都放弃了电动化，中国一个国家是否能够支撑这一转型就很难说了。

不过，特朗普2.0应该不会成为把电动车扼杀在摇篮里的极终杀手。普及到10%的市占率以后，电动车在汽车产业可以说已经站稳了脚步。在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市占率已经近半了。而且增长势头强劲的插电混动基本上也都是作为电动车使用的。

今后一段时间里，电动车的普及速度或许会减慢，但却不会停下脚步。中国可以先考虑“立足国内，望眼世界，扩大基建，满足刚需”的战略。

(4) “普及率不超过30%”与“敌人是碳素”

在日本，丰田汽车有一个著名的论断：“电动车的普及率不超过30%”。中国的事实却表明，在充电桩以及电力供应跟上来的情况下，电动车的普及率超过30%是一个大概率的事情。这两年电动车的确遇到了停滞不前的问题，但是价格、基建、安全以及舒适度，这些问题的改善的速度是很快的。至于电池寿命以及持续时间就更不在话下了。

中国的电动车在上下游产业链都占据优势了以后，自然会外向发展，向东南亚等传统日本汽车势力圈发展，最终乘势蚕食燃油车的势力版图。

日本的网上检索“电动车シフト”，弹出来的关联词最多的是1. 失败，2. 现状，3. 嘘（虚假），4. 终了，5. 今后，6. 失速。¹⁰⁾日本曾经是汽车电动化的先驱，前期一直引领电动技术的发展，现在却成了一个妥妥的反电动车国家。我把这称为在电动车竞争中失去了信心以后的表现。

现在日本社会不愿意正面电动车的心情十分明显，但是避得了一时避不了一世。日本的汽车产业太大太强，这使日本这个国家对汽车这个支柱产业的依赖十分严重。说汽车衰则日本衰绝非言过其实。

日本社会上弥漫着的强烈的反电动车气氛极大地拖了日本车企向电动车转型时的后腿。日本是一个具有扭曲现实能力的国家，这种能力是一种天赋，是个人和国家成功的基础条件。但是，这种能力有两面性，它会促使好的更好，也会促使坏的更坏。

“敌人是碳素”，出自丰田老掌门的这句话也没说到点子上。二氧化碳是地球

10) 检索日：2025年1月9日。

温暖化的罪魁祸首，但是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排出的二氧化碳已是天量，所以减碳势在必行；但是，减少碳的总排出量固然重要，所谓积重难返，短期内根本不可能见到实效。因此在此之前，人类当务之急是减少人口密集区域的空气污染。我们治理环境污染的初期，先是把污染严重的工厂搬到郊区，后来又搬到更加远离市区的偏远地区，最后才是彻底关闭这些工厂。这些做法跟新能源转型时现实主义的减碳策略是同一个道理。

“敌人是碳素”这种说法，一种可能性是为了转移论题误导议论的方向，另一种则是错误的问题意识。前者需要在做好准备后及时回到正确的问题意识上来，知错能改善莫大焉，速度慢了的话无异于天灾人祸；后者则会导致思考的方向性错误，是一种根本的错误。

“全方位”云云就更是不知所云了。碳的总排出量跟市区的空气污染的程度也并非完全等同的关系。为了减少碳的总排出量的确需要多管齐下，全方位的减碳战略是没错，也尽可以去做。但是具体到必须跟基础设施建设配套展开的车用新能源，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就只可能是一种了。

(5)中国的造车实力

中国最初在东北长春造解放牌卡车，在上海造上海轿车。卡车因其生产性而量产，消费性轿车的生产一直规模不大。从朱镕基1980年代中期在上海引进德国大众以来，中国致力于发展小汽车产业已经近半个世纪。长期以来，民族车企只是配角。但是这些企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造车技术本身也日渐成熟，所缺的无非就是品牌。中国车企在引擎技术上的差距实际上早在10年前就已经很小了，电动车技术最近的突飞猛进实际上也是水到渠成。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国内车企一旦在电动车确立了品牌效应，必然会外溢到电动车以外的车种。如果不是有品牌光环的保护，外资汽车的份额可能在10年前就已经大大下降了。失去了品牌光环的加持，即使是德国和日本这样的汽车王国，在燃油车上亦非江山永固。在地域上，东南亚等日企占据绝对优势的地区正在面临中国车企的猛攻。

媒体夸大了中国造车的混乱局面：几千家，几百家大混战，激烈内卷，死尸累累。一定程度上的混乱是必然的，符合自由竞争的原理。这几年已经整理整顿了不少，局面也逐渐晴朗起来。所谓的新势力已经只剩下了理想、零跑、蔚来、小鹏、小米和哪吒6家。

2014年是中国造车新势力的元年，很多公司只是注册（400家左右），实际上造出车的大概为60家左右，只用了10年就大浪淘沙了。加上传统的几家（问界、极氪、深蓝、岚图、阿维塔、智己、智界和享界等），在数目上跟日本并无多大差别。日本则有丰田、本田、日产、铃木、马自达、斯巴鲁、三菱、五十铃等一众世界著名车企。不要忘了国内的汽车市场是日本的七到八倍，向世界市场进军也才刚刚开始。

(6)电动车作为一种刚需

在日本，电动车被认为是一种不实用的时尚产品。只有那些喜欢追赶时髦的少数人才会买回来摆着。

对电动车的需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环境污染的容忍度。①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圈）的环境问题是电动车普及的动力。在电动车价格没有下来的时候主要将会是比较富裕的国家为了解决城市日益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而主动补助电动车。②北欧国家则出于对环境的高标准严要求而加大了普及电动车的脚步。③今后，在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人口众多的大城市，电动车可能会成为一个长期稳定的刚需。由于这些国家人口上超大规模的城市存在，电动车经成为改善空气污染的直接有力的方法。印度国内有好几处这样的超大城市，比如孟买、新德里以及加尔各答等。圣保罗、开罗、伊斯坦布尔、达卡、墨西哥城，马尼拉，曼谷，印尼的雅加达。另外，非洲的经济发展也会导致这样城市的出现。

随着电动车价格的进一步降低，电动车的经济性会上升，对电动车的需求的范围也会进一步扩大到不那么富裕的地区和社会阶层。电动车关联技术的日新月异正在加快这一进程。

电动车成为一种刚需，这将会成为一次汽车产业的盛宴。巨大的浪潮会把一些企业推上浪尖顶峰，也会把另一些企业遗留在沙滩上。

(7)改革改型机不可失

日本汽车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日本是传统的汽车王国，但日本在经济上也对汽车产业高度依赖。高到无法失去。②日本国内市场不大，国内转圜的余地小，主要还得去世界上的几大市场吸金。但是因此也是日本的自我保护壁垒只能在国内发挥巨大作用，到国际上就要大打折扣了。③日本国内的状况对日本车企在世界上打拼不利。④汽车已经是当今世界上的过熟产业，缺乏扩张空

间，各大公司都是在存量上进行零和竞争，其中的得失的影响往往是直接的。

丰田老掌门表示，不愿更加积极向电动车转型的原因是因为发展电动车会导致大量失业从而动摇国家的经济根基。但是问题不因为闭上眼睛就会消失。这其实是个长痛和短痛的问题，短痛的话一开始可能会出现一些失业，但却有利于增强企业的体质。在尚有体力时不痛下决心，厉行改革，反对改型，拒绝转型，等到不得不改时往往就晚了。到了这时，大量失业和国家经济根基动摇就很难避免了。

2027年或许会成为下一个关键的年份，这一年现在被认为是全固态电池上市的一年。掌握全固态电池巨大优势的丰田等一众日本车企能否在这一年重振雄风呢？

丰田是一个伟大的公司，也是现在的世界老大。但是日系车企进行的是一种孤独的战斗，在转型问题上并未得到来自日本社会的支持。只能靠国外的部分单独应对电动车转型的危机。本来，日本国内市场每年销售400多万部新车，规模不小，如果这部分能够率先甚或是及时跟进都会是一股不小的助力，可惜保守的日本社会一点都不给力。在外的部分只能加倍努力了。但这是长久之计吗？

从市场规模来看的话，中国是日本的七到八倍。中国必然成为日本车企的主战场。光靠日本国内的市场是支撑不起来一个汽车王国的。从2022年算的话，已经过去快三年了，两年之内没有起色的话，王国危矣。剩下的时间真的不多了。2027年的全固态电池的机会如果能抓住的话，日系车企还有柳暗花明的可能，不然问题可就大了。

日产是日本最早量产电动车的厂家，但是 Leaf 以后就停滞不前了，日产在电动车上慢半拍的决策是它始终未能达到获利的原因。日产在处理前社长戈恩的问题上受伤不小，戈恩虽然手脚不干净但却是拯救日产的英雄。

本田的决策速度比较快，对电动车的力度也较大，跟日产合并不是一个好想法。虽然市值差别很大，实际上两家企业的规模和实力不相上下，对等合并的话很难融洽。弱弱联合，被日产拖了后腿的话本田也陪进去亦未可知。日产跟鸿海合作虽然有损于日本的民族感情，说不定会有新的天地。日产这次说不定是鸿海最后的机会。问题是鸿海谋求发展电动车已有多多年，但是苹果后退以后就没了声音。

(8) 电动车的缺点

除了充电设施以外，那些所谓的电动车的缺点并不成其为缺点，因为这些都是能够也必然会在发展的过程中得到不断改正和改善的。同样还有电池的持续时间，稀有金属的可持续性问题，回收技术的社会体制问题，等等。至于寒冷地区问题，实际上现在世界上普及率最高的是北欧国家，正是标准的寒冷地区。

即使现有的技术已经能够基本克服这些所谓的“缺点”了，更不必说电动车方兴未艾，今后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还有很大的技术发展空间。

丰田的代表作是混合动力汽车（HEV），普锐斯极大地提高了汽车的燃油利用效果。但是，混动并非新能源汽车，而是不折不扣的燃油车。无论怎么提高 HEV 的汽油利用效率，普锐斯都需要定期去加油站加油。最大的问题是，混动改变不了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市区直接往空气中排出废气的问题。混动成不了前述的刚需。

现在日本国内经常把 HEV 跟电动车或者插混 PEV 进行燃油经济效率上的比较，这不仅意义不大，而是还有可能误导日本国内的民意，把最后一点可能的机会也丧失掉。

(9) 历史的转折点

自从特斯拉公开专利，中国车企迅速跟进以后，包括氢在内的其他新能源的可能性就消失了。并非氢能源不环保，不可持续，而是因为在家用小汽车选择新型能源时，氢能源跟电力之间实际上是一种选择的关系。在选择已经向电力开门的情况下，对其他能源的门就关上了。

并不存在所谓的“全方位”战略的可能性。原因无他，任何国家都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同时进行两套基础建设。在世界上唯一能够快速搞出一套新能源基建的中国选择了电动车以后，氢能源或许就只能在小汽车以外的领域谋求有限的发展了。但即使这样同样也需要面临基建的限制，以及造氢时的能源消耗和环保的问题。

当然，氢作为一种能源的未来性不可否认，氢用在乘用车上同样能够实现在人口密集的市区零排放。而且在一些地区和使用领域，氢在可携带性和可储存性上具有电力所不具备的优越性。氢还是一些产业的副产品，偏远地区生产的过剩电力也可以转化为电力加以保存和运输。这些决定氢在未来某些使用领域还有竞争力。不过这些都是相对性，人类对氢能源的利用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主要的

是氢的剩余价值，也就是废物利用。基础建设的后进性决定氢能源在乘用车领域已经失去了跟电力竞争的可能性。

(10)小结

关于电动车转型的问题，我很早就注意到了。但是一直觉得跟自己的研究领域不搭界，所以一直旁观了下来。现在事情的发展之迅速超出了我当初的预测。说实在的，有点后悔。

发展到今天，电动车的前景已经比较明瞭了。疫情这几年各国停滞不前，但是中国一直在勉力前行。电动车最近遇到了一些问题，其中部分有中国车企大幅领先使得各国车企失去了部分战意方面的原因。

电动车对改善中国人口密集的城市市区的空气质量发生了良好的作用。事到如今，即使全世界都放弃，恐怕中国也会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混动车在节省能源方面很优秀，但由于不属于新能源车，解决不了大城市圈等人口密集区域对杜绝汽车尾气排放的刚需。人类对新能源的选择跟基建密切相关，历史的发展已经做出了选择，抗拒它是跟自己过不去。

汽车产业是日本的支柱产业，日本经济对它的依存性很高，日本不能失去汽车产业。同样日本车企不能失去已经占下的超过日本国内规模的中国市场。电动车不会一统天下，但是仅靠剩下来的市场份额养活已经巨大化的日本车企。

日本车企有很强的实力，特别是长期的努力形成的品牌效果很强大，信誉是日本车企最大的财产。日本的问题是国内缺乏对电动车的刚需。岛国的自然环境的优越性，但是对产业的发展却是不利的。这是一道必须迈过去的坎。

不光是汽车，人类其他各种移动工具的电动化方兴未艾。但是对处于颓势的日本车企来说时不我待，今后能否迅速决策或许会成为关键。这是日本车企，其实也是几乎所有的日本企业甚至整个日本社会的软肋。